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进程中的伟大斗争

王公龙

【内容提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在推动合作的同时，适度开展有策略的伟大斗争，有助于排除干扰，扫清障碍，坚守底线，坚定捍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和目标。伟大斗争既包括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作斗争，也包括同推销“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等做法作斗争。斗争的目的不是消灭对手，而是追求在斗争中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在斗争中壮大主体力量，在斗争中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开展伟大斗争必须重视策略的运用，做到在交往中斗争、在合作中斗争、在转化中斗争。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伟大斗争 反霸权主义

作者简介：王公龙（1967-），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上海20023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未来世界发展的美好构想，其实质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构想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表达了当下人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实现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构想无疑需要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携手合作，坚持不懈地加以推动。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必然充满极其复杂的伟大斗争”^①。世界各国人民只有勇于同一切逆世界历史潮流、背离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大势的理念和行为作斗争，才能巩固合作的基础，强化合作的动力，校准合作的方向。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式，斗争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伟大斗争的有力推动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人们，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人类社会既是命运共同体，又是矛盾共存体，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本身就是解决矛盾、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过程。在争取国际合作的同时开展必要的斗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摆脱自我中心主义观念的束缚

观念是行动的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强化人类命运与共的意识，确立命运共同体观念。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

^① 鲁品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当代国际基本矛盾的中国方案》，《学术界》2019年第6期。

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然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中，无论在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中都不程度地存在着自我中心主义观念和意识，这是制约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深层思想阻力。自近代以来，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在西方社会中，以个体、自我为本位的文化价值观被逐步确立起来。在个体层面，这种价值观崇尚个人主义和个性张扬；在国家层面，西方国家强调自我利益优先、本国利益至上，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维护一国私利。这种观念不仅给近代以来的世界带来了无尽的矛盾、冲突和灾难，而且也日益无法应对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从更宽广的视野看，无论是“个人中心主义”“民族国家中心主义”还是“地区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历史文化价值观，都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忽视群体和外界的存在。然而，日益严峻的全球性危机一再提醒世人：各种形态的“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已不合时宜。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发起一场破除中心主义的思想运动”^②，对各种过时的“中心主义”观念展开清理和扬弃。但必须看到，自我中心主义观念的形成有漫长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基础，长期影响着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并已形成思维定式，内化于它们的行为方式中。西方国家至今依然占据世界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主导地位，也绝不会主动放弃这种让他们长期获益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唯有坚持不懈地与之进行斗争，深刻反思自我中心主义观念的弊端，让国际社会深刻认识其历史局限性、政治狭隘性和现实危害性，进而打破这种习以为常的“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全人类利益的整体性、一致性和优先性观念才能确立起来，人类才能更好地培育出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调整和改良现行国际秩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是重塑和改良现行国际秩序，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现行国际秩序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维护的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霸权利益。尽管这套国际秩序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改革现行国际秩序已势在必行。一方面，霸权国家对现行国际秩序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经常将自身的政治意愿和利益需求凌驾于现行国际秩序之上，对国际秩序的存续构成威胁。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接连退出多边国际机制的“退群”行为等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深刻的改变，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希望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以体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发展的平衡化和国际制度的公平化。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必要的改良和完善，使之更加公正、合理。但改革国际秩序无疑会触动西方国家敏感的政治神经，注定成为一场复杂而尖锐、充满博弈和较量的斗争，既要面对国际秩序制定者、主导者的阻挠和反弹，又要抵制霸权国家肆意破坏国际秩序的行径以保持现行国际秩序的总体稳定；既要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合理诉求，又要兼顾国际秩序主导国的既得利益；既要强化国际秩序的跨国界全球治理功能，又要兼顾民族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受损害。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共同价值的维系，价值认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和稳定的基础条件。正是看到价值认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

② 曹绿：《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3期。

而持久的意义，中国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①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和主张。然而，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历史、民族、宗教、地域等因素的差异塑造了世界不同的文化。文化的差异必然反映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上。由于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是漫长历史积淀的结果，具有相对稳定性，要让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接受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易事，要让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建设的价值尺度和国际社会的行动准则难度则更大。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取向只能是全人类的价值共识，以强权为后盾，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他国之上，或者以某种地域性价值取向代替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做法必然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对和抵制，也会偏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定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利益融合的过程，也是凝聚价值共识的过程。而凝聚价值共识不仅需要思想上和风细雨的对话和交流，有时也需要开展针锋相对的较量和斗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统筹把握“两个大局”之间的互动关系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②之所以强调胸怀“两个大局”，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互动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融合交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环境下形成和展开的。它既是世界大变局的组成部分和现实表现，也是世界大变局的巨大推动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必须置于世界大变局的宏大背景下来谋划，充分发挥中国对世界大变局的积极影响，借势用势、谋势造势，使之朝着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变。但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对的风险挑战也会形成某种交织、叠加甚至是捆绑效应；中国国内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与国际大变局中的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形成彼此牵动、相互转化的联动效应。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会聚焦中国形成巨大的国际政治效应，牵动国际格局，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强调统筹把握“两个大局”的实质就是要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③，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正是基于统筹把握“两个大局”的战略考量，党中央一再提醒全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④。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伟大斗争的现实指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

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7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①。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展开的伟大斗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矛盾，更不是某些具体的、枝节性的分歧，而是应对各种事关捍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向、维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局、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存续的风险和挑战。斗争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制约各种消极因素，努力创设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环境和舆论氛围，最大限度地将国际社会的力量引导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上来。伟大斗争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特点。所谓基础性，是指斗争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条件而展开，比如经济全球化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条件。离开了基础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的根基就不可能稳固。所谓全局性，是指斗争牵动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的大局，关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主要多边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斗争的结果直接关乎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和走势，关乎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光明前景。所谓关键性，是指斗争牵动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围绕世界和平、发展、安全等重大问题而展开，斗争的前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决定性影响。开展伟大斗争，有助于化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重大阻力、重大风险和重大隐患，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推动国际社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上形成更加广泛的共识，扩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基础，增强国际社会对成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显然，伟大斗争不同于人类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的国家间战争和军事对抗。斗争对象也不是某个特定的或固定的国家或群体，而是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各种思想、观念、政策和行为。

1. 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

自近代以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是造成国际社会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尽管 21 世纪的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行为至今阴魂不散，在世界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依然屡见不鲜。在当今世界上，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肆意损害别国主权、粗暴干涉别国内政，试图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他国，甚至动辄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近年来，个别超级大国毫不掩饰地宣称自我利益至上，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动辄以损害他国利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来谋求自己的私利，这无疑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主张背道而驰、根本对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主要障碍，一个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世界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就不能容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早在 2013 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②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仅仅依靠协商和对话是不够的。历史一再启示人们，任何一种过时落后的思想观念都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为了延续自己生存的时间，它们总是与先进的思想观念进行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因此，寄希望于霸权国家自身更正利益观念和行为模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促进国际合作的同时开展必要的斗争以抵制、牵制、抑制霸权主义的抬头，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选择。基于上述逻辑，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中国一再申明，将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永

^①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273 页。

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中国也决不放弃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①。

2. 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作斗争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和全球价值链生产就是利益共同体的集中体现。利益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利益共同体发展的目标指向。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的理性选择，也是造福人类的希望所在。从这一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世界经济客观趋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依据，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主观意愿，事关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当今人类只有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推动构建包括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治理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等在内的各种形态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逐步从构想变为现实。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一股强大的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工具，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造成了干扰。为迫使对手就范，对美国做出让步，特朗普政府对世界众多国家挥舞关税大棒，甚至公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股逆流。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直面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并为之展开较量和斗争，以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正在“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②。为此，中国积极倡导国际社会坚持开放政策，推动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合力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指出：“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③近年来，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中国始终坚定立场，争取通过谈判解决双方的争议，同时也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做法及时采取了反击措施，给美国的嚣张气焰以回击；另一方面，中国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继续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3. 同推销“普世价值”的做法作斗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在真空状态下建设理想社会，而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资本主义依然占据世界体系优势地位的背景下构建新型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让人类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竞争和博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占据、垄断、掌控世界话语的演化方向和发展态势，从未放弃通过对外推销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把持主导权、话语权和控制权的企图。对西方超级大国而言，宣扬和推广“普世价值”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就是通过推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扩张战略，巩固其21世纪全球霸权地位。为此，冷战结束以来，超级大国在“普世价值”的伪装下一次次制造或推动了颜色革命，给世界一些地区和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动荡、地区乱局和发展危机，严重背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持久和平、普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4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2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3、481页。

遍安全、共同发展的理想目标。中国之所以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目的之一就是揭穿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本质，与其展开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和斗争，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新的价值取向。尽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已经被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不会轻易接受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更反对社会主义中国提出的主张长期持防范甚至抵触的态度。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与西方推销“普世价值”的做法开展必要的斗争，在斗争中坚定地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

4. 同各种形式的“文明冲突论”作斗争

“文明冲突论”用西方排他性、对抗性、集团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当代世界，认为存在着差异的不同文明之间无法和平相容，只能形成相互对立的互动关系。依据这种世界观来审视和判断当下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只能加剧国际猜疑和对抗，引发更多的国际冲突，世界也因此永无安宁之日。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就必须从根本上破除“文明冲突论”的魔障，建构起崭新的文明互动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构建一个文明包容的世界，“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①。但必须看到，“文明冲突论”作为一种论调虽然出现在冷战结束前后，但它是对西方社会看待文明关系范式的概括，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要让信奉“文明冲突论”的人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易事。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新型文明关系，除了推动文明对话之外，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同各种形态的“文明冲突论”作长期、艰巨、尖锐的斗争，以争取实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美好前景。

5. 同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背道而驰的行为作斗争

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给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也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峻挑战。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既是当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紧迫任务，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有力抓手。病毒不分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国际社会理应携手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渡难关，共克时艰。但西方霸权国家在自身抗疫不力、广受国际国内舆论批评指责的情况下，竟然极力甩锅中国、嫁祸中国，蓄意炒作“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甚至提出要对中国搞秋后算账，要中国提供巨额赔偿。为了捍卫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正义事业，在合作抗疫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同西方霸权国家的无理、荒谬行径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为此，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向世界讲明中国抗疫的艰辛历程，努力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密切合作、与美国等国家保持信息沟通、与世界各国分享抗疫经验的客观事实，并对美国的无端指责予以有力回击，揭露其阴谋和险恶用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一些政客“意图转嫁责任，破坏全球抗疫合作，中方奉劝其多做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利益的事，而不是相反”^②。“污蔑攻击、甩锅推责都弥补不了失去的时间，唯有加强团结合作，才能够尽快战胜疫情。”^③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4页。

^② 《外交部评美政客指责中方隐瞒疫情：停止诋毁中国、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http://www.gov.cn/xinwen/2020-04/01/content_5497763.htm。

^③ 《2020年3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64266.shtml。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中开展伟大斗争的路径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是美好的，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谓新的历史特点，是指这场斗争发生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既需要传统意义上开展革命斗争的精神追求和意志品质，更要有崭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1. 在斗争中求同存异、扩大共识

共识是行动的基础，有共识才能汇聚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最基本的思想共识。当今世界，各国在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宗教观念、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各国在是否构建、如何构建以及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社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认知和判断也有显著的不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开展伟大斗争，不是搞唯我独尊，排除异己，把不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政策统统拒之门外，而应本着开放包容的心态，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斗争中沟通，在斗争中争取理解，积极主动地在不同的观念和主张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从世界文明的宝库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丰富实践中汲取有益的智慧，最广泛地凝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在斗争中壮大声势。从长远的眼光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推进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保持共识，最大限度减少阻力，坚持不懈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2. 在斗争中壮大主体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则。之所以如此突出“共”，就是为了表明，全人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力量，也是开展伟大斗争的实践主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但中国不应是这场斗争的独力承担者。这不仅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推动，让世界人民从中受益，而且因为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的阻力可能也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各国的不同领域，既可能来自官方的政策，也可能来自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因此，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中国不应孤立地开展斗争，而应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要积极争取非西方国家的广泛参与，又要争取西方国家中的各种积极力量；既要争取各国精英的支持，更要争取各国社会大众的支持。唯有汇集最广泛的斗争主体，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平台，同各种阻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的思想观念和政策实践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斗争，才能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强音、主旋律。

3. 在斗争中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好的构想，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国际社会都必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时刻准备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由于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霸权国家将其看成中国实现崛起的战略手段。近年来，西方总有人一再极力污名化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视之为中国对抗美国霸权的战略设计，把“一带一路”倡议描绘成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把中国出面组建的亚投行看成对抗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的工具，把中国倡导并推动经济全球化、完善全球治理看成中国挑战破坏国际秩

序、试图在国际秩序上另起炉灶的证据，等等。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考量，西方霸权国家往往会对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种设想、主张污名化、妖魔化，甚至设置各种障碍，直接横加阻挠。随着中国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中国越是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霸权国家的焦虑感就越强。在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设计，而是与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交织在一起，成为反映国际政治矛盾和斗争态势的晴雨表。国际政治较量越是严峻，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的斗争就越是激烈。鉴于此，只有清醒认识和预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切实管控好大国之间的分歧，避开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才能有效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稳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四、灵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伟大斗争的策略和方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求同去异、求同存异、存同存异的过程。所谓求同去异，就是扩大和增进共识，在沟通和对话中尽可能消除彼此间误解和分歧；所谓求同存异就是在正视分歧的同时争取扩大共识的空间，维持合作的态势，不让分歧影响合作的大局；所谓存同存异就是客观理性地看待彼此间的共识和分歧，把共识和分歧看成矛盾的统一体，看到共识中有分歧、矛盾中有共识是事物发展的常态，对分歧和矛盾的出现保持平常心。在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展开的斗争既不同于历史上世界大国间经常发生的以消灭敌对国家政治军事力量为目标的殊死较量，也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以消灭政治对手、推翻反动集团政治统治为目标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而是以化解各种困难和阻力、建设美好世界为导向的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历史进步过程。开展这样的伟大斗争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策略。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过去人们熟知的各种战争语境下的对敌斗争方式和手段，而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创性实践中探索和总结斗争的策略和艺术，做到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①

1. 在交往中斗争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 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普遍交往发展的逻辑产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的是世界普遍交往的历史大势，只有不断深化各国之间的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实现的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斗争不同于历史上你死我活的热战，也不同于当年柏林墙两边老死不相往来、剑拔弩张的冷战，而是在世界日益相互依存的大背景下开展的交往、互动和磨合。无论遇到何种复杂矛盾和巨大阻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必须始终坚持促进普遍交往的基本方向，创造一切有利于普遍交往的机会和条件。任何违背普遍交往的历史潮流，人为地设置交往障碍乃至自我封闭和孤立的行为都不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秉持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在开放中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针对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中国始终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并从中思考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

① 习近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541页。

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①

2. 在合作中斗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历史过程，没有合作共赢就不可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采取斗争的方式，但斗争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是与合作紧紧结合在一起。斗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合作是主流，斗争不是排除合作、挤占合作的机会。相反，斗争只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合作，消除不利于合作的因素，开展更加健康的合作。近年来，美国对华挑起贸易战，通过不断加征关税，大搞贸易霸凌主义，试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中国就范。但中国始终本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既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间分歧，又坚定地捍卫原则，坚定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此，中方一再强调：“以贸易战相威胁，不断加征关税的做法无益于经贸问题的解决。中美应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本着善意和诚信，通过磋商解决问题，缩小分歧，扩大共同利益，共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同时，中方也明示自己的原则立场：“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会理性对待，但是中国不会畏惧任何压力，也做好准备迎接任何挑战。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显然，中方始终在灵活运用斗争手段，一方面展现敢于斗争的姿态、不惧斗争的勇气；另一方面努力使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把斗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程度上，避免让斗争破坏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争取实现“斗而不破”。基于此，中方依然强调：“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希望美国同中国相向而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管控经贸分歧，加强经贸合作，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增进两国和世界人民福祉。”^②正是通过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中美双方才能在保持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3. 在转化中斗争

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置对手于死地，消灭对手，而是为了实现转化，争取对手，尽可能壮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创造更加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条件。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③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开展斗争，也要注意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把有不同意见和主张的国家或民族一概不加区分地看成永远的敌人，而是要在找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时，尽一切可能去做转化的工作，找到可以争取和转化的力量，在孤立极少数顽固敌对势力的同时，努力分解对手，积极争取理解和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不可否认，尽管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已有几年时间，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和呼应，但西方国家有的持观望态度，有的持质疑甚至敌对态度。要改变西方某些政客的冷战思维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抵触态度并非易事，但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各国社会大众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和支持，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始终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采

①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人民日报》2019年6月3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323页。

取有力措施控制疫情对外扩散，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维护世界人民生命健康、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高度肯定。习近平总书记还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通电话，阐明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①，表达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主张，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的认同和支持。面对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迅速扩散，在开展抗疫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同时，中国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在全球抗击疫情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呼吁，“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②。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是各国人民合作抗疫的人间正道”。他还呼吁国际社会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③。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伟大目标的实现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都必须面对并克服各种重大阻力和严峻挑战，在斗争中探索前进的道路，开辟光明的前景。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作为一场深刻改变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方式、重塑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运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在推动广泛合作、深入合作、持续合作的同时，开展适度、有策略的斗争，不仅不会偏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而且有助于排除干扰，扫清障碍，坚守底线，坚定捍卫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大方向，有力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 [1] 邓纯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
- [2] 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 [3] 赵士发：《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 [4] 刘建飞：《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两制国家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2期。
- [5] 郑必坚：《全方位构建国际“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几点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 [6] 阮宗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世界梦”》，《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 [7] 杨洁勉：《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思维和谋划》，《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
- [8] 鲁品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当代国际基本矛盾的中国方案》，《学术界》2019年第6期。
- [9] 黄瑶：《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和平搁置争端》，《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编辑：张晓敏）

① 《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通电话》，《人民日报》2020年2月12日。

② 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20年3月27日。

③ 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0年5月19日。